

法治周刊

责任编辑:卢越
新闻热线:(010)84151683
E-mail:rbly@163.com

广东要求建立恶意欠薪案沟通制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记者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业联合会正式会签《进一步加强调解衔接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的意见》,合力搭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共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

《意见》明确了各方职责,要求法院、劳动仲裁机构为工会、工商联和企业联合会提供业务指导,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需有效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工商联、企业联合会作为企业代表,教育引导企业自觉履行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引导企业和劳动者沟通协商解决劳动争议。《意见》确立了“法治导向、调解优先、沟通协调、多元化解”的工作原则,要求五家联动单位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探索解决劳动争议的治本之策,共同关注和研究劳动争议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求会签单位在各自制定相关规定制度时,必须彼此通气,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并要求将调解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优先方式。

此外,《意见》要求在化解劳动争议上,共同建立恶意欠薪案件沟通制度、劳动争议预警预报制度,以及诉调衔接、调裁衔接、裁诉衔接和工会法律援助衔接制度。根据《意见》规划,五家单位将推动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工会调解和法律援助站,并进一步加大委托调解力度,经双方同意可将案件委托工会、工商联、企业联合会进行调解,切实降低双方解决纠纷的成本,为双方及时修复劳动关系创造条件。

青岛民事诉讼申请监督案可“检察和解”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青岛市检察院近日发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检察和解”新规定,规定明确提出:除当事人拒绝和解之外,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监督的民事裁判和执行案件,适宜进行和解的,先行检察和解。“检察和解”是指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办理民事诉讼申请监督案件过程中,基于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在检察官引导下,经释法说理,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也可建议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

根据新规定,以下九类情形可进行检察和解:一是发生在家庭成员或者亲属之间的民事纠纷,经过劝解,当事人能够尽释前嫌,有和解希望的;二是案件存在瑕疵但不符合监督条件的;三是生效裁判、调解书及执行裁定、决定确有错误,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进行监督预期效果不明显的;四是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但生效裁判实体结果上并无不当的;五是争议标的额较小,进行检察监督的收益小于司法成本甚至诉讼成本的;六是原生效裁判并无不当,但有新证据证明推翻原审判决,且当事人对新证据无异议的;七是各方当事人均具有和解意愿的;八是符合检察监督条件,但对方当事人系弱势群体的;九是具备和解可能的其他情形。

“检察和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强制和解,也不会因检察和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检察和解达成后,检察院将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并根据需要发送给当事人。对于当事人拒绝进行检察和解或经协商不能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院将在审查期限内及时作出审查决定。”该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西宁发出青海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本报讯(记者那生祥 通讯员关为清)近日,青海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针对一对夫妻离婚纠纷的诉讼,发出了青海首份“婚姻冷静期”通知书,限定这对夫妻冷静1个月,期间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

3月1日,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家事调解室来了一对夫妻吴某与马某,经法官了解,夫妻二人是自由恋爱后结婚的,婚后育有一女,20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感情甚好。后来,马某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经常酒后胡言乱语,还摔砸东西并殴打吴某,导致夫妻二人矛盾不断升级。吴某无法忍受马某的恶习,遂将其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官调解,吴某坚决要求离婚,马某则不同意,并表示会戒酒改掉恶习。家事调解室法官认为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并未完全破裂,决定暂停诉讼程序,停止调解,尝试给双方1个月的“婚姻冷静期”。这一个月內,双方都不允许提出离婚。

据了解,“离婚冷静期”制度采用强制原则,法官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能拒绝。在冷静期内,法官会与当事人亲属寻找离婚纠纷双方的矛盾根源,积极开展劝和工作,帮助双方当事人平息纷争。一个月的冷静期届满后,吴某与马某再次来到城东区人民法院家事调解室时已面带笑容,马某改掉了酗酒的坏习惯,吴某也表示谅解,双方和好。

核心提示

3月15日,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高票通过。最终面世的民法总则206个条文,是在草案一审稿的186条的基础上增加而来的。其中,接近70%的条文做了修改,即使是字词间顺序的简单变化,其背后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

民法总则,为你而立

本报记者 卢越

5月3日下午,中国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谭启平刚结束近4个小时的民法总则专题讲座,时间已经来到了18:20,这比预计的结束时间推迟了50分钟。

作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谭启平这次授课的对象是重庆市人大系统的信访干部。讲座结束后,有干部围上来对他说:“时间太短了,还没听够。”

这让谭启平感到欣慰,“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着民法总则的重要性。”

在今年3月15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次会议闭幕会上,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高票通过,中国民法典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后,第二步是整合民法的其他法律,如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按计划,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争取在2020年3月将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

条文博弈反映的是科学立法

最终面世的民法总则206个条文,是在草案一审稿的186条的基础上增加而来。其中,接近70%的条文做了修改,有些条款甚至在每次审议的时候都要改上一遍。

有些条款在几次审议稿中删除又恢复了,有些条款变更了被纳入的章节位置。到草案四审稿成形时,还吸收了许多语言学家的参与,每一处结构、每一个字词甚至标点符号都经过了精心考虑。

在谭启平看来,每一次的博弈过程,都是权利本位的基本理念下科学立法的过程。

在三审稿中,第112条原本这样表述,“自然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最终这一条变成了第113条,调整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此前,无论宪法、民法通则,还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在财产保护方面都没直接点出“平等”二字。

“以前法律上强调的是对国家财产的特别保护,现在把个人的财产权利放在了同等保护的地位,一视同仁。”谭启平说。

即使是字词间顺序的简单变化,其背后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

民法总则第2条的表述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在民法通则中,“人身关系”原本被列在了“财产关系”之后。

“这有着重大的意义。”谭启平说,“这个变化凸显的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保护。”

在中国法学会研究会秘书长王轶看来,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的核心就是自由,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基本规定一章所确立的不得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以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彼此印证,相互呼应。”

贯穿民法总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则原本在草案三审稿中作为民事权利行使时的基本要求,出现在第133条,而后来则作为立法目的,被提到了民法总则的第1条。

“三审稿出来后,有否定声音说‘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民法典里写进核心价值观’,但仔细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24个字,从各个层面来讲,其主要内容都和民法的精神原则有着高度的契合。”谭启平说,“我们应该有这种立法自信。”

你该知道的民法总则

汇聚普遍共识伴随立法全过程

2015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担起草民法总则的任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以参与单位身份进入课题组。与此同时,法学界召开的相关研讨会在许多高校遍地开花。

2015年4月30日,中国法学会民法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民事主体问题的研讨会。包括民法学界、商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的诸多一流学者都高度关注,前来参会。

谭启平回忆,当天在场的每位专家都难掩兴奋,“参与民法典编纂,是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

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是民法专家,因为每个人都在从事民事活动。民法总则由起草到出台的过程,就是汇聚普遍共识、民主立法的生动诠释。

2016年6月、10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每次审议后,都要将草案审议稿在网上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民法总则草案一度成为“网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次网络公开征求意见中,总计有15264位社会公众对民法总则提出了69386条意见。此外,还有基层群众、社会团体、法学研究人员等各界人士通过邮寄或快递的方式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每次公开征求意见后,都根据各方意见对草案作了较大修改,或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或是对草案规定进一步完善,或是使草案内容更通俗易懂。

比如,一、二审稿时,第9章是“诉讼时效与

除斥期间”。在人大常委会讨论时,有委员提出,“除斥期间”的表述太专业了,老百姓不明白。到三审稿时,这个法律专业术语就不再使用了。

“一部不能反映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共识的民法总则,不会是一部得到人们尊重和信仰的民法总则。因此可以说,征求民众的意见是伴随着整个民法总则的起草过程的。”王轶说。

对21世纪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

“作为21世纪的民法典,要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在民法总则里,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以及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作出的回应。”王轶说。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对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王轶认为,不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传统代表性法典制定时不会遇到,甚至不会想象到,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也不会想到回应这样的问题。

在王轶看来,我国编纂的民法典,能够超越以往民法典的,正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上适应时代需求的调整 and 改变。

民法总则出台后,谭启平在授课时总会建议讲台下的大学生们将民法总则的206条都能背下来,“这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谭启平觉得,这一届的法科大学生们处在了幸运的好时候,“入学时赶上民法总则的编纂,毕业时又刚好能见证民法典的颁布”。

“民法总则‘高天上’吗?一点也不。它为你而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此感触一定会越来越深。”这是谭启平对听课者最常说的话。

洛阳“生母及其情夫虐童案”一审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0年和无期徒刑

虐待孩子有了重刑判例

本报讯(记者余嘉熙)近日,备受关注的河南洛阳“生母及其情夫虐童案”一审宣判,两名施暴者因故意伤害罪分别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无期徒刑。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涉及刑法保护的虐童案中罕见的重刑判例。

2015年9月,河南洛阳一名不足2岁的女童小辛怡(化名)被其生母刘姣利的情夫赵跃飞多次用胶带捆绑、扇耳光、烟头烫等方式伤害,致其重伤并造成一级伤残,而施暴期间刘姣利并未制止。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在各方爱心人士接力救助下,受害女童辗转多家医院救治,至今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

近两年后,刘姣利和赵跃飞最终受到了刑事处罚。这让不少人想起了2015年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该案中,南京一名男童被其养母使用跳绳抽打致轻微伤,经两级法院审理,施暴者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两起虐童案虽情节轻重不同而量刑相差甚大,但相同的是两起案件均因为施暴者对受害儿童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而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也再次引发了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加强儿童刑法保护的诸多思考和呼吁。

一直以来,因刑法中缺乏“虐童”相关的针对性法律依据,加之施暴者多为受害人直接监护人,各地对

于虐童事件的处理一度陷入情与法的纠结,常态是“无人告法便不究”。鲜有追究施暴者刑事责任的案例,这长期刺痛着全社会的神经。

“这两起判例突显出刑法对受虐儿童保护的重视程度,对施虐者起到威慑作用,具有样本意义。”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汉宾说。但他同时表示,我国目前没有针对性的“虐童罪”,比较接近的两个罪名为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但构成这两项罪名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而从近年来频发的虐童案来看,一般情况下都是造成严重后果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刑法对儿童权益保护的力度仍然不足。

记者查阅发现,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和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刑法中并没有针对性的保护条文。这一现状,也使当下法律界关于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加强刑法对儿童人身权益的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如果设立虐童罪,就可以保护到非家庭虐待的受虐儿童,不再出现将加害者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不符合虐童行为要件的罪名立案的情况。”在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郑磊看来,法律的完善只是给受损的权益提供最后的救济,要使儿童不再受到伤害,还得国家建立全方位的预防和监督机制。

一张“难产”的工伤认定书

山东莱芜市的聋哑人卢诗亮在一起生产事故中意外死亡,其母倪秀兰向有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部门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法院判定超期不属于申请人自身原因,限该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处理,5个多月过去了,该部门仍未作出工伤认定。

本报记者 丛丛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镇尹家庄村妇女倪秀兰手握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一脸茫然。儿子卢诗亮几年前在工厂的一次事故中意外死亡,倪秀兰向所在地莱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为儿子进行工伤认定。人社局对她的申请不予受理。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倪秀兰要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诉求。目前,判决生效5个多月了,人社局依然没有作出工伤认定。

两年多后,母亲得知儿子发生不幸

时年47岁的卢诗亮曾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大庄村村民卢诗广开办的新型墙体砖厂打工。2013年10月5日,在该厂建车间的村民王永勤雇佣的工人鹿洪波误将砖房内搅拌机启动,造成正在干活的卢诗亮死亡。事故发生后,厂方并没有按

规定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办理死者的工伤认定,也没有及时将死者的不幸告知他的母亲,而是私下里由卢诗广的砖厂、王永勤、鹿洪波三方与死者的叔叔商讨赔偿事宜,最终达成了一次性赔偿给死者的叔叔赔偿款23万元的协议。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72岁的倪秀兰是一名残疾人,患有精神障碍,她在卢诗亮十几岁时改嫁到了距前夫家十几公里之外的杨庄镇尹家庄村,卢诗亮的父亲20多年前已去世。改嫁他乡的倪秀兰与儿子长期不在一起居住、生活,因而少有联系。

2016年2月的一天,倪秀兰意外得知儿子两年多前意外死亡的消息。于是,她向所在地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当天就以工伤认定申请超出了法定一年期限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

对此,倪秀兰感到十分冤屈,尽管申请工伤已超过了时限,但并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儿子发生不幸,作为母亲本该在第一时间知道,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告知她。

法院认定申请工伤超期“情有可原”

在律师的帮助下,倪秀兰在法定期限内向莱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人社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

莱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参与

处理卢诗亮意外死亡事件的相关单位、部门和人员以及他人向倪秀兰告知了其子意外死亡的情况下,倪秀兰超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非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该种情形下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人社局仅以卢诗亮的死亡时间为申请期限届满,认定倪秀兰系超规定期限提出申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于当年7月27日作出判决,撤销莱城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限莱城区人社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第三人卢诗广砖厂不服一审判决,向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人社局也出庭参加诉讼。

卢诗广砖厂辩称,倪秀兰和死者不在一起居住,在死者生前未尽到抚养义务,且事故善后已经处理完毕,补偿已经到位,倪秀兰没有资格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倪秀兰作为卢诗亮的母亲,有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且不受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死亡职工的父母提出工伤认定进行限制。

人社局答辩称,对倪秀兰提出工伤认定的资格没有异议,但是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确已超过了一年的申请时限。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卢诗亮死亡后,用人单位卢诗广砖厂明知卢诗亮的母亲有精神障

碍且已改嫁他乡,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告知倪秀兰卢诗亮死亡的事实,人社局将超期申请的举证责任转嫁给倪秀兰不当,人社局应当对倪秀兰的申请依法予以受理。

2016年11月29日,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判决生效5个月,还在等待作出认定

倪秀兰的代理律师、山东棋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德尧告诉记者,二审判决对卢诗亮因工作事故导致死亡的事实已经作出认定,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同时二审判决也明确阐明人社局应当受理工伤认定,但人社局以申请材料不足为由要求倪秀兰补充材料。他们按照人社局的要求及时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仍被告知证据材料不足。

今年3月7日,倪秀兰将人社局告上法院。人社局于当月作出了受理工伤认定的申请。此时,距判决生效已过去4个月。孙德尧说,人社局目前虽然受理了工伤认定的申请,但是是经过一年零两天的等待和三次诉讼的结果。

记者了解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0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目前,倪秀兰仍在等待中。